

现代风险社会对教育功能的影响探析

——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

■黄 丽

摘 要:教育功能不仅具有正向性,而且具有负向性。教育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正向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教育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异常条件会使教育正向功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并派生出多种偏离行为,产生许多期望之外的不良功能。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可以看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危机的“解属性化”、个体生活的“解常规化”和文化系统的“解传统化”对当代教育功能产生了诸多影响。

关键词: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现代风险社会;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4)10-0007-04

众所周知,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又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教育功能是教育活动和系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教育在系统内部表现为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在系统外部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教育功能不仅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而且具有方向性和多方面性。

一、教育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

教育可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但未必都是如此。在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正如《学会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1]。在现实教育中,诸如“应试教育”、种种不当的“教育惩罚”、过重的学业负担、唯“智”是举等现象和做法,由于某种“异化”而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生个性潜能的充分实现;而在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方面,也可能产生整体的或局部的负向功能。早有学者指出:“教育这个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如果只用于保守固有文化,固定阻碍社会的进步,如果不顾当前事实的需要,硬要这个工具灌输不能实现的幻想,也足以增加社会的混乱。”^[2]由此可见,教育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正向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即并非所有的教育都能发挥正向的促进功能。教育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异常条件会使教育正向功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派生出多种偏离行为,产生许多期望之外的不良功能。

作为沟通社会 and 个人的教育,外部社会系统对教育系统及其内部系统各个环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分析教育系统外部的社会系统如何促进或阻碍教育正向功能的发挥问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风险社会理论正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前社会——教育系统的外部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可以为我们审视当前教育功能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带来诸多启示。

二、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现代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是从风险视角研究当代社会变迁理论的总称。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将未来社会明确界定为一个风险社会,指出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之中,贝克也因此成为风险社会理论最重要的创立人。风险社会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视角,将人为因素、自然因素、生态因素、制度结构因素等纳入研究视野,并将风险问题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之中。

风险社会理论的“世界风险社会”诊断无疑也将中国纳入其中。正如贝克所述:“中国的情形与此不同,但在很多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在中国,“集体体制下所保证的收入,即所谓的‘铁饭碗’已经被打破,合同正在取代国家包干,已经把收入、工作能力、表现联系了起来。如今,人们希望把握自己的生活,按市场价值购买获得

的服务”^{〔3〕}。因此,风险社会理论对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同样有着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尝试透过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功能问题进行探析。

三、现代风险社会对教育功能的影响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风险现象就一直存在。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消除外部风险,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速的历史,也是风险问题不断复杂化、人为化和尖锐化的过程。在前农业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存随时可能受到威胁,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们只能顺从于自然,听命于自然。进入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进步,人类开始主动利用自然,以局部性的能力优势,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状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带来了空前的社会风险,使得现代社会既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奇迹的时代,也是人类面临危机丛生的时代。一方面,人类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提高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类也加重了破坏自然的程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以及核风险、基因风险、生化风险等空前的科技风险,加之局部战争、种族歧视、民族冲突、核武器威胁、艾滋病蔓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毒品泛滥、精神萎缩、信仰危机等,人类的生存境遇和人类文明已经面临巨大的威胁。

(一)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危机的“解属性化”对教育功能的影响

随着人类实践手段的高科技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人类自己制造了一个风险社会,也正是这样,使得人类处于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之中。在风险社会理论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观点。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社会联系的增强,由此,任何一种社会危机也将呈现出全球化效应,并加剧社会危机带来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全球化的风险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普遍的痛楚。现代化风险的扩张带来了自然、健康、营养等危机。这些危机独立于生产,并通过食物链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

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危机倾向分为经济系统中的产出危机——经济危机、政治系统中的产出危机——合理性危机、政治系统中的投入危机——合法化危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产出危机——动机危机四类,并且认为经济、政治系统中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4〕}。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整合依赖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

“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4〕}因此,全球性的各类社会风险就成功地实现了其“解属性化”,其表现在文化系统中,自然也就表现在教育系统中。也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危机的出现,以至于社会文化系统的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家和劳动系统意识形态核心因素——世界观遭到质疑,被体现动机危机的“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逐渐吞噬,形成了贝克所指出的以“为自己而活”为核心的个体自我实现伦理,个体需要向上流动的期望和预期逐渐增强。

正因为这样,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个体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个体化是指如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是“制度化的个人主义”^{〔5〕}。个体化过程一方面被理解成为一种生活境况和生涯模式的改变,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由于社会群体失去了统一的认同以及成为一个成长性政治势力的机会,个体化过程剥夺了社会认同的阶级差别,此时,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另一方面,解放了的个体,其境况彻底地依赖于劳动市场。可以说,他们是市场依赖在生活(谋生)的各个角落的延伸后果。他们不再仅仅是私人境况,而总是制度性的。由此,个体境况表现出一种新的特征,跨越了分离的私人领域和形形色色的公共领域。它们拥有矛盾的两面性——依赖制度的个体境况。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教育、消费、福利国家的管理和支持,并最终使“制度的外表成为个体生涯的内在品质”^{〔6〕}。

教育作为一个相对较好的抵制向下流动的方式,成为人们可选择的解决“个人危机”的最有力的武器,越来越表现为“内需”的性质。这就为教育系统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增强了,不仅表现在受教育的时间延长、受教育者的范围扩大上,还表现出对“教育公平”要求的增强;另一方面,对教育功能的功利化要求也增强了,即人们希望通过正规学校教育而获得个人职业成功的动机增强了,使得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蔓延。由此,在教育功能促进个体发展的世界观上,与真理相关的信仰和人文精神追求退居到科学信息掌握的后面,一种具有理想特征并深入生活的教育生活让位于过于关注外部科学“非理性”世界的教育生活。至此,教育功能中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出现了“异化”。

(二)现代风险社会中,个体生活的“解常规化”对教育功能的影响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包含了两个特色主题:一是环境主题,或者说“风险主题”;二是“个体化主题”。在

这个时代,出现了政府职能、国家权力、会计组织、经济功能和超国家文化活动,同时也出现了功能被卸载转由私人承担的情况。因此,“我们既有全球化,也有个体化,二者是平行的,都是第二现代性的基本特征”〔3〕。

当代人类的世界风险社会境遇也突出地反映出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反映出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出了问题。概言之,当代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极端的盲目的消费主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工业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基础之上的。这就势必会导致人们只注重社会发展的物质成就,在人生观上体现出享乐主义和现世主义,忽视社会发展的副产品,造成了对自然物质资源的无限制开发;势必会把人的生命和生存活动局限于有限的、前定的、单一的、不变的物种生命规定之中,造成了“人生的危机”,势必会导致人们缺少精神生活,不懂得真正敬畏和尊重生命,不再追求真善美,不知如何辨别真伪善恶,不知如何区分美丑,势必会导致人们失去生活的意义,感到更多的迷茫和不满。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从现代社会的全面异化出发,批判了现代社会的主导工具理性理念,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悖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走向自我毁灭的社会。但在风险社会理论中,风险并不一定等同于灾难和危险。相反,风险社会是一个人们选择余地扩大了的社会,因为风险本身也意味着创新和选择的可能性。

于是,现代生活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如上帝、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爱、婚姻等都转变成“不确定的自由”,人们的生、死、性别、肉身、身份、宗教、婚姻、亲子关系等都能根据附属细则来抉择。这一发展预示着固定的、命定的人的形象的终结,“作出决定,哪怕是明明无法决定”这一行为摆在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位置,冲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人成了种种可能性中的“选择人”,人生成了“选择性人生”、“自主人生”、“自反性人生”,但选择并不一定会“成功”,因此,自主人生也总是一种“风险人生”、“有危险的人生”,甚至变成“破裂的人生”。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人们正在步入“个体化社会”。在此,这种“不确定的自由”正在掌握着生活,它包含了种种混合形式、冲突和矛盾。在现代风险社会,个体生活实现了“解常规化”。

社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规范化,只有与具有高度社会成员认同感的世界观和道德体系联系起来的,社会才能建立起具有稳定秩序的社会。个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活,个人若是脱离社会,不但会面临无数仅靠自己无法应对的危险,而且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同时还会造成自身无法忍受的紧张。但在当代社会,“当种种限制变得可渗透并最终被冲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帝的

东西或者自然事先给定的东西,如今转变成了种种问题和抉择,体现于私人生活的行为中”,“上帝、自然和社会系统正在以或急或缓的步伐被困惑、彷徨、无助、茫然的个体逐步取代”〔3〕,以至于人们常常处于“超负荷”状态之中,教育功能也常常处于“超负荷”状态,就连传统社会所形成的规范的伦理道德也变得“形式化”了。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处于“解常规化”的状态之中。在人们增强对外界自然的利用能力的同时,世俗知识却越来越脱离世界观,世界观也越来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社会整合能力逐步减弱,通过教育帮助人们形成统一、规范世界观的理想也逐步渺茫。至此,教育功能中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也出现了“异化”。

(三)现代风险社会中,文化系统的“解传统化”对教育功能的影响

随着现代性后果的种种显现,风险社会也迎来了一个对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工业社会的自反性首先是从对科技活动的客观约束理论开始的,全球风险将生产和科技活动的“不可预测”的副作用置于人们关注的中心位置。为了规避和消除风险,社会科学家们试图通过理论中对自我概念的反思来达成实践中社会活动改变的目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当代社会和政治在现代性之下经历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从第一现代性转向第二现代性。第一现代性即结构现代性,社会被视为线性系统。线性系统中有一些单个的平衡点,只有外部力量才能打破这种平衡,导致系统变迁。第二现代性的自反性个体化则认为存在着非线性开放系统。这里不平衡与变迁是通过反馈环路内在作用于系统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一现代性涉及裁定判断和规则遵守,个体是反思性的,第二现代性则涉及规则探寻和反思性判断,个体是自反性的。作为人们社会化主要手段之一的教育,在其内部的各个方面,也必然随着人们对其内在需要的改变,都显示出自反性的特征。

由于第二现代性是由非线性系统强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和技术系统来调节的,因而呈现出常态性的混乱状态。生活在第二现代性的个体,由自反性获得了“为自己而活”的不确定自由,同时也就把“解放”和“异化”相混合的“易爆”性赋予自身。随着第二现代性的到来,人们不仅需要面对各种全球性社会风险的威胁,还要应付因种种“不确定的自由”而带来的困境。传统生活中世俗的、常规的“确定性”被分裂成了种种问题,个体普遍、共同的“焦虑”取代了个体普遍、共同的“需求”,致使社群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阶级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风险社会中“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致使文化系统出现了“解传统化”现象,从而冲击、批判、否定着传统的文化系统,也带来了教育功能的“紊乱”甚至是“断裂”。

现代风险社会中,文化系统的“解传统化”在个体生活里的突出表现是“核心家庭”及家庭教育的“解传统化”。众所周知,不同性别不同特征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如果没有男女角色的不同,就不会有传统的核心家庭;如果没有核心家庭,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及其典型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贝克认为,随着个体化的发展,人们逐渐从阶级文化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传统的性别角色变得模糊了,核心家庭及传统家庭教育在当今变得“解传统化”了。于是,“在所有男女共同生活的模式中(婚前、婚姻和婚后),世纪的冲突爆发了”^[6]。冲突通过配偶双方不同的职业流动、家务劳动和教育孩子的劳动分工等方式所引发。而制度性解决方法的缺乏,如缺乏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白天的教育儿童的时间、不充分的社会保障等,将更加加剧私人关系中的冲突。传统家庭及家庭教育中所要求的统一性在面对决定的时候分崩离析了:“女人反对男人,母亲反对孩子,孩子反对父亲。”^[6]贝克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所有从外部冲击家庭的东西——劳动市场、就业体系或者法律都以某种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和简化的方式进入个人领域”^[6]。至此,“在家庭再生产和依赖市场生产的定型过程中,两个具有相对立的组织原则的价值体系的时代——现代性和现代的反现代——在工业社会中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两个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并且相互对立的时代”^[6]。家庭教育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

对于这样一个建立在“个体化”之上的社会,是否

有可能整合呢?贝克在他的著作《个体化》一书中分析了整合价值、物质利益和国族意识三条路径都不可行之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整合只能‘在思想中’实现”^[3]。从贝克的回答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第二现代性社会中,文化系统将担任起“社会整合”的重要使命。既然文化系统可以将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生态等系统的风险成功地“转移”到社会的个体中,那么,通过教育这一手段改变个体,实现各种社会风险的降低和规避就将成为可能。因此,在当代,教育功能应更加注重反思、探索、培养人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整合社会伦理规范。这一使命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88.
- [2]陈祥林.教育社会学概论[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3.10.
- [3][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7.9.22.
-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55.55.
- [5][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 [6][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60.129.144.144.130.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上海 邮编 200062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Risk Society on Educational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ck's Theory of Risk Society

HUANG Li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ducational function i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huma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conditional because it will be seriously hampered by some abnormal conditions inside or outsid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bringing about a variety of deviance with many poor functions beyond expectation. Based on Beck's theory of risk society, we can see that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deattribute of social crisis, the deregularity of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detradition of cultural system all have exerted a lot of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risk society.

Key words: Beck's theory of risk society; modern risk society; educational function